

“乡愁城市”丛书 丛书主编·薛冰

闲雅成都

朱晓剑〇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乡愁城市
薛冰主编

闲雅成都

朱晓剑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雅成都 / 朱晓剑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7

(乡愁城市 / 薛冰主编)

ISBN 978-7-5641-7234-3

I. ①闲… II. ①朱… III. ①城市文化—文化史—成都—通俗读物 IV. ①K297.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1854 号

闲雅成都

著 者: 朱晓剑
责任编辑: 许 进
出版人: 江建中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5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41-7234-3
定 价: 46.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

电话: 025-83791830

目 录

自序 | 1

一 城建篇 | 5

- 金沙古国的迷踪 | 5
- 武担山小史 | 9
- 成都创城史 | 12
- 张仪筑成都 | 15
- 沧桑南市 | 19
- 锦官城与车官城 | 24
- 成都名楼记 | 27
- 扩筑罗城 | 31
- 芙蓉城内外 | 35
- 从蜀王府到皇城 | 38
- 满城与少城 | 42
- 成都的边界 | 46

二 交通篇 | 50

- 两江铸造成都文明 | 50
- 两江之上的古桥遗韵 | 53
- 文翁治水兴蜀 | 57
- 南方丝绸之路 | 60

- 成都商道 | 63
- 摩诃池记事 | 67
- 浣花溪的世界 | 70
- 消失的解玉溪 | 73
- 水道的演变 | 76
- 两河上的渔光曲 | 79

三 街巷篇 | 83

- 华西坝上 | 83
- 宽窄生活 | 86
- 春熙路琐记 | 89
- 人民南路史 | 94
- 街区：商业与生活 | 97
- 公共空间新型思考 | 100
- 建筑的野蛮生长 | 104
- 北改与城市功能的变迁 | 107
- 城市美学的重构 | 110

四 文化篇 | 114

- 两江文化的勃兴 | 114
- 漆艺和茶文化 | 117
- 蜀笺的时代 | 121
- 扬一益二的来源 | 125
- 翰林图画院与成都画派 | 128
- 游乐的良辰美景 | 131
- 流连灯会 | 134
- 川味问世 | 139
- 园林和人文景观 | 142
- 文化生长 | 146

参考书目 | 149

自序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高速发展的这几年，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宽广，可是看到的旧街巷、老茶馆一一在消失。曾经迷恋的慢生活在逐渐远去。这时候，真不知是该感叹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还是一个坏时代。

有不少周末时间，我到送仙桥喝茶，与一群文化老人相聚，茶里乾坤，叙说晚清或民国旧事，人非物亦不是。当再次回看昔日的旧影，留恋，却不可追。当宽窄巷子人来人往，人民公园里传出喧闹的声音……有时难免会疑惑：这里是成都？

是的，这里是成都。只是越过时尚与传统，我们再回来望，万里桥头，诗人的咏叹早已成为过去式，杜甫说：“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刘禹锡说：“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薛涛说：“万里桥头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陆游亦有诗句：“万里桥边白版扉，三年高卧谢尘鞅。半窗竹影棋僧去，满棹苹风钓伴归。”穿越历史时空，诗歌在这里交汇，生活在此一一展开，构筑成成都的一种意象，那是一种慢时光。

有时，走在老街巷，看着歪斜的墙体上书写着“拆”字，不免有点迷茫。但看历史风云，城市的拆建似乎从未间断过，不管是战火还是城市规划，让成都变得日益妖娆，或是荒凉，都曾是这座城市发生过的旧事。

若考察成都的建城史，其地理变化在最初是以两江为核心构建城市，随着人口的迁移，城市在变大，城市也逐渐有了规划。故有竹枝词说：“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内请分明。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正是成都城市龙脉特色的写照。汉代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的发达，让成都成为举世闻名的城市。虽然在后来的历史上，多数时候，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存在，却因经

济、文化的繁荣,使不少诗人在成都流连,不舍离去。为什么会这样?通俗的解释是,成都的生活安逸且有保障,容易让人乐不思归,“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就是最佳的证明。

唐时成都,进入罗城时代,成都的城市基本上定型,虽在五代时的两蜀时期有所变化,但成都的生活气氛更加浓厚。从薛涛、杜甫、花蕊夫人等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一个繁花似锦的都市,让人迷醉不已。宋代时的陆游写成都的诗歌颇多,在他的笔下,成都的市井风物亦多有记载:“尚想锦官城,花时乐事稠。金鞭过南市,红烛宴西楼。千林夸盛丽,一枝赏纤柔。狂吟恨未工,烂醉死即休。”(《海棠》)又:“安得连车载郫酿,金鞭重作浣花游?”(《到严十五晦朔郡酿不佳求于都下既不时至欲借书读之而寓公多秘不肯出无以度日殊惆怅也》)陆游曾对儿子陆子虞回忆说:“五为州别驾,西泝僰道,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尝为子虞等言:蜀风俗厚,古今类多名人,苟居之,后世子孙宜有兴者。宿留殆十载,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东下,然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其形于歌诗,盖可考矣。”

说到享乐,那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生活,在唐宋时期就多有记载,比如游宴、灯会、游江,那是每年的盛会,且地方官常常是与民同乐,这所体现的是庶民的城市生活,红杏尚书宋祁成都倡游宴所留下的佳话,绝不只是个案。这说明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过着平和自然的生活。宋祁有诗说:“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云抒颂无。”

此时的成都文化达到一个高峰。诗歌、音乐、歌舞、戏剧、绘画已非常繁盛。戏剧又有“蜀戏冠天下”之称。成都大慈寺规模宏大,有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多间殿房,在殿房厅堂的墙壁上,从唐代后期到北宋前期,由当时本地或流寓蜀中的许多著名画师,绘下了上万幅以佛教题材为主的壁画,并有无数的雕塑,成为唐宋时期全国佛教绘画雕塑的艺术圣地,大慈寺的壁画被称颂为“天下第一”。

元代时的成都,却失去了这样的氛围。明代成都因生活秩序的恢复,城市建设也有所变化,以蜀王府为标志的建筑,象征着成都的一时繁华。但随着明末战争的来临,张献忠的屠川,成都再度陷入城破家不在的境地。考察这一时期,那也是成都文化最为凋敝的时代,皆因读书人也好,士绅也罢,都已经消失殆尽。这种元气的恢复直到“湖广填四川”才有所改观。但也正因这一次大移

民,成都的城市性格逐渐得以留存下来。

学者王文才说,成都城垣市区之变,以隋展少城、唐筑罗城与明初改建为甚。这也说明,长期以来,成都城的城建规划相对统一,沿袭旧制与重新筑城成为城市变迁的核心考量。当然,这不只是从筑城的技术考量,也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民情以及经济实力相关。

成都城市规划与建设,总是随着战乱而有所变化,历史越久远,记录越缺乏,如考察成都街巷的变迁史,也多半是追溯到晚清时期,但好在城市格局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两江滋润着一代代成都人的生活,这其中的悲欢离合穿越历史的时空,依然可感可知。

不管是作为旧时国都的都城,还是一省之首府,成都都是当之无愧的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中心。成都作为天府之国,当然是依赖于自然环境的良好,但这也与成都人的独特生存技能相关,比如交子的诞生、雕版印刷的流行、蜀笺的风华绝代,无不是在闲雅的环境中进行。

今天的成都尚保留着些许闲雅的影子,从其骨子里的状态看,还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虽然晚清至民国一段历史,风起云涌,成都虽时而不时走在时代的前列,却还是始终保持了独有的创造性。比如川菜定型、文化再造、茶馆文化等等都进一步得以确定和发展。成都是一个以庶民生活为主的城市,因之,常常以欠缺伟大的梦想著称。可我们也知道,在多数时候,成都并不羡慕京派海派文化,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新陈代谢。

随着交通业的发达,长期依赖于水运的成都也逐渐在转型。这与今天的城市转型虽有相似之处,即城市的变大,交通拥堵、城市设施不足、雾霾加大等因素逐渐成为城市的病症,却还是有着些许细微的差异。那么,今天的成都所承载的不再是单纯的文化记忆或是民俗记忆,而是更深刻地影响到城市性格的因素: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风景同样构成了成都的闲雅,只是多数时候,我们难以停下来打量罢了。

快节奏,慢生活。在梳理成都的城市史时,或许我们更容易看到这个城市失去的固然有不少值得珍视的内容,然而,在今天所创造的,也更应该是我们珍视之处。在写作《闲雅成都》时,我频频在街头行走,以期获得街巷的存在感。很快会发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有不少街巷消失,对照旧时的地图,更容易发现,传统与时尚,正是构成这座城市的流动盛宴。诗人说:岁月已作结,我们

在路上。是的，不管怎样，闲雅会一直在路上，她以自己的姿态前行。有幸，我们跟她同走了一段路。

那就记下这些许的城市变迁，以及细微的幸福，这也包括成都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这也是我写作《闲雅成都》的初衷。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一 城建篇

金沙古国的迷踪

十二桥遗址是成都最早的都城吗？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似乎可以这样确定。但随着金沙遗址的挖掘，忽然发现这个遗址要早于十二桥，也就是说，最早的成都城是在金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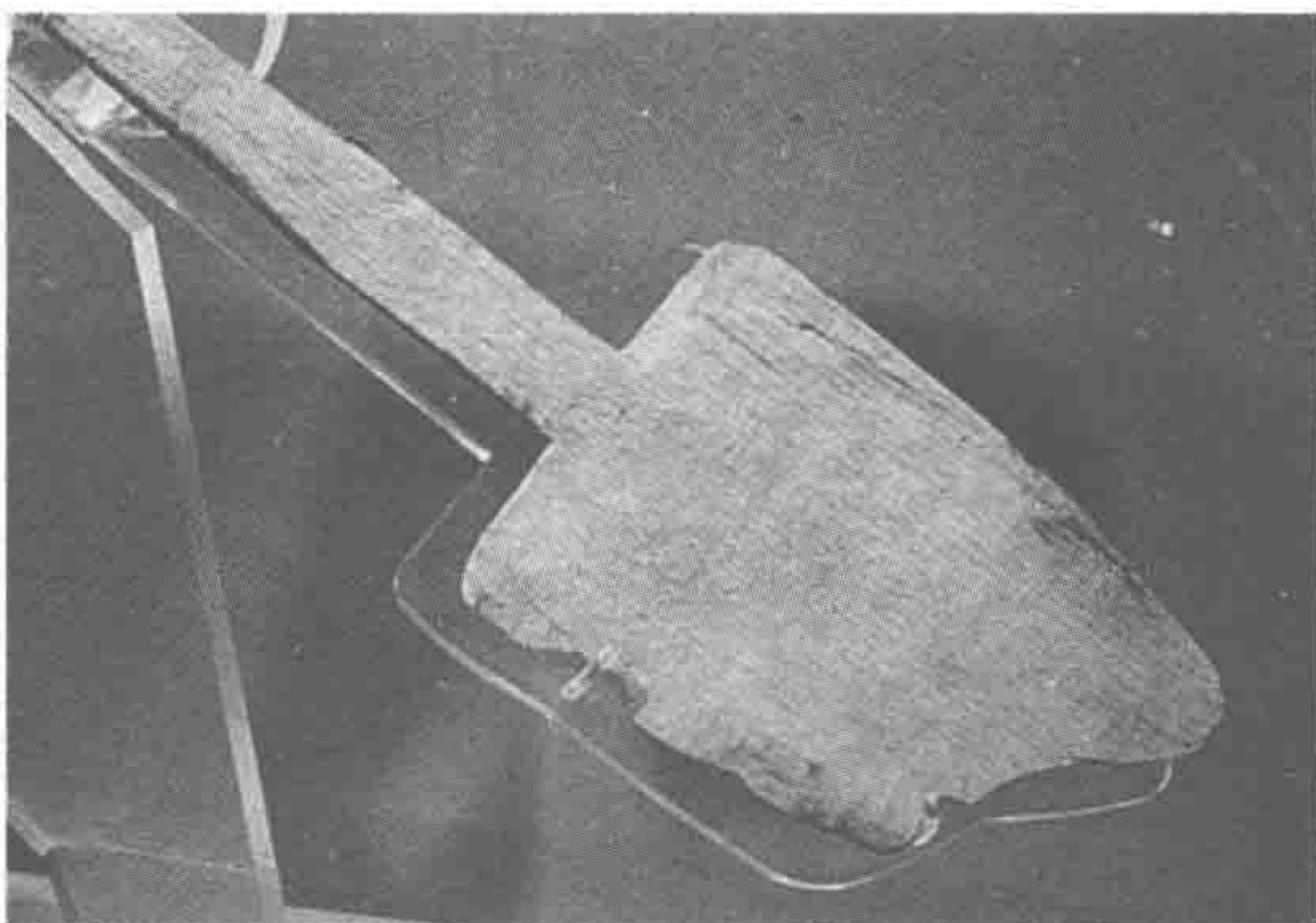
金沙王都的存在时间是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至公元前六〇〇年。而这个都城，也不是川西平原最早的都城。这是因川西平原在都江堰未治理以前，常常遭遇水患，且不可救药地会摧毁城市（城市防护措施相应很低）。比如新津的宝墩古城就是这样被毁灭的。

后来，王朝即迁移到了金沙。《成都城市史》认为，成都应是蜀人逐渐放弃游牧活动，适应平原农耕生活的最后定居点。

金沙遗址，以前属于苏坡乡金沙村。更久远的历史有着怎样的故事，这虽语焉不详，但至少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金沙古国的印象。

这一切在二〇〇一年二月八日揭幕，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道工地时挖出了很多像象牙的东西和小玉片，这可能跟三星堆有关系。继续挖掘，于是就有了金沙遗址的出现。

后来复原的古蜀生活场景显示出：三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到处是茂密的森林，成群的动物生活其间，其中有一些凶猛的动物，例如老虎和大象。金沙人十分敬畏的对象是大象，因之捕获大象的日子也许就是一个节日，人们将象牙献给国王，当作祭祀品或者装饰品。



金沙古国出土的木耜

石器时代，金沙先民就开始了新生活。打猎已经不是这个原始民族主要的生存方式了，金沙先民懂得如何生产粮食，他们处于先进的农耕文明状态。

在金沙遗址出土了农耕用具耜。耜的起源很早，《易·系辞下》中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记载，它是一种翻土用的

农具，适用于稻作农业。成都平原地区的稻作农业历史，经考古资料证明四千多年前即已存在。耜的长度约一点四二米，珍贵的原因是“木质器物，一般难以保存下来，在考古中极少发现”。耜的出土有力证明了金沙人的农业已经相对发达，安定的农耕生活使人们有很多的空余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大量的陶器出现了。

制陶业在此时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很多金沙人从事这种行业，且有比较完善的分工合作。金沙人制作的陶器大都为夹砂褐陶和灰陶，制作工艺以手工制作和慢轮加工为主，器形以实用为主，纹饰较少，素面居多。金沙遗址范围内发现有多处窑址，均是小型馒头形窑，每个陶窑的面积约六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烧制时火焰由火膛进入圆形窑，这对充分燃烧提高窑温是比较有利的。

这些陶器包括了各种炊器、食器、饮器、水器、酒器，还有大量的贮器。这些丰富的器形，充分反映了当时金沙人饮食的多样性。这些陶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具或酒器。而酿酒活动的前提是有多余的粮食，说明当时农产品的富余。

金沙王都的全貌让世人瞩目到古蜀的文明是怎样的发达。

在金沙王都的整体布局当中，不仅有居民生活区，还有祭祀区、墓葬区。倘若从建筑基址的分布看，则让我们看到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

我们先来看看建筑，在今天的“三和花园”地方，发现一处大型房屋基址，占地面积逾一万平方米，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布局上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根据房址的面积、布局结构和周边的出土文物综合分析，

推测应该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公元前一〇四六年—前七七年)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

从考古留下的资料,或可看出当时的生活场景:在该区域共发现房址十七座、窑址十七座、灰坑三百余个、墓葬十三座等重要遗迹。该区域房屋的修建相当考究,墙体是挖基槽埋柱子的木骨泥墙式结构,基槽宽约半米,槽内小的木骨洞排列规整而密集,大柱洞间距约一点四米至一点五米。其中最大的一座单体建筑宽近八米,长度五十四点八米,至少有五个开间,面积在四百三十平方米以上。

很显然,金沙人在建筑上是有着精心的考量,才有如此的规模。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划,大概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凌乱的城址。

如果说这里是王都的话,那么一般庶民生活区就简洁得多。一般居址区位于金沙村的兰苑、金沙国际、博雅庭韵等范围内,分布较广,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

在这个居址内,有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房址基本上为西北—东南向,构筑方式均为木骨泥墙式建筑。这类房屋的面积不大,多在二十平方米左右。由于没有直径较大的木柱支撑,房屋容易垮塌,重建的次数较多。这也说明城市居民对城区生活的认同(抑或是对城外生活安全感的担忧)。

考古发掘时,工作人员只能看到沟内密集的木(竹)骨洞。在居址区房屋的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灰坑,坑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及大量石器。其中有些灰坑非常规则,成排分布,内置一些体型较大的陶器。有的坑中还埋藏有大量完整的陶器,有的坑中夹杂有大量的草木灰。这些陶窑均为小型的馒头窑。

这勾勒出的是金沙先民的生活场景。在这个王都里生活的人群虽然不是今天所说的天府之国的概念,但也是相当的繁华。

金沙王都是沿着两江修建的城区。这从城区分布也可看得出来。其最重要的“祭祀区”,是古蜀时期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分布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米,年代约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前六五〇年),它沿着郫江古道的南岸分布。

专家们推测,古蜀人很可能最初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将祭品埋在河滩上,上面用土进行覆盖,下次祭祀仪式之后又将祭品掩埋。经过长约五百余年的祭祀活动,至春秋早期,河滩基本填平。祭祀区宏大的场面

真实体现了古蜀王国雄厚的实力，繁多的祭品承载着先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古代工匠非凡的创造力。但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这块金沙人心中的圣地也就逐渐荒芜。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这条古河道的消失也是人为作用的结果。这似乎也可解释金沙王都为何会下移到十二桥的问题。简言之，金沙王都已不太适宜人类居住。

还有一个说明是，此时的墓葬区在今天看来，颇为奇怪。居址区附近已发现了一千余座墓葬，分布面积约三万平方米。

这些墓葬大多数是居址区废弃之后形成的，因此墓葬大多打破居址，就地墓葬。这样的墓葬结果自然是使城区变得狭小起来。

各墓区内都有一定的规划，排列有序。以“燕莎庭院”地点的墓地规模最大。墓葬均为西北—东南向，头向西北或东南，以东南方向为主。

墓葬的细节也值得关注，一般分为一次葬和二次葬，盛行二次葬。葬式大多为仰身直肢，也有少量俯身葬和屈肢葬，还有的死者双手抱于胸前。约半数的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数量也不多，一般随葬的为陶器和石器，个别的也有一定数量的铜器和玉器。从发掘的墓葬情况看，随葬品规格、数量、等级等不算高，也还可看出当时的社会有明显的分层与等级划分。

然而，城市规划井然有序。祭祀区、王都、生活区、墓葬区，各有其应有的位置。此时，看不出手工作坊有详细的规划。但从考古挖掘看，也许是手工作坊就在居住区之内。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金沙古国的面积并不是太大。

从此处，可见到成都平原古都的城市规划大致如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具有悠久的城市历史和丰富的建设经验，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城池选址原则，除“择中”“相土”“形胜”等城市选址思想外，水资源条件作为重要的自然因素，在原始村落选址乃至城池选址中也常常受到高度重视。金沙古国的城市建设、规划或与此多少有些相关。

金沙王都对外又有怎样的经济关系？虽然我们至今都不大清楚，但从其中挖掘出来的各种器物如金器、青铜器、陶器、玉器等等来看，固然手工水准达到极高的程度，但也还与周边地区，乃至于西亚、中亚等地保持着繁荣的商业贸易，如此才留下数量丰富的器物。

金沙古国在城市规划上虽然不像后来城市建设者那样有许多的生态思考，

基本上还是处于择地而居的场景,但也已初具规模,相当数量的人口聚集在一起,有王都在,也就决定了其成为川西平原的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

此时,周边的居民或会像今天说“上成都”一样,称之为“上金沙”吧。商人在此处买下了相应的物品,再运回乡间贩卖,也就构成了川西平原的商业网络。

然而,这古道历经千百年,早已消失无踪。即便是村落也早已变迁得面目全非,唯有器物还在叙说那段历史了。

在金沙遗址,曾经发掘出一条古河床,位于金沙古城的心脏地带。地质学教授刘兴诗在古河床中发现了一根巨大乌木,躺卧在河床堆积物中。他认为,这个古河床是洪水冲破古城墙后,直插进来的,无异于一柄锋利的剑,一剑封喉地终结了繁盛一时的金沙古城的生命,也使古蜀文明突然中断。

金沙古国的迷踪,这只是一面,至少是给我们揭示了古蜀时期的成都是怎样的一座城市,而这也是古蜀文明的最佳体现。

武担山小史

若说成都市区有山有水,恐怕也让不少人产生疑惑:水有锦江,山嘛,哪里有?古时成都却有两山最为出名,一是学射山,一是武担山。

学射山即今天的凤凰山,其初名斛石山,唐代为演武之地,又可供人游乐。薛涛有诗《斛石山书事》:“王家山水画图中,意思都卢粉墨容。今日忽登虚境望,步摇冠翠一千峰。”宋代则为较射游乐之地,这才有了学射山的名字,然亦有传说,蜀汉刘禅曾在此学习射箭。费著《岁华纪丽谱》说,成都人每年三月三日在此登山竞射。在较射时山上设彩棚射场,有乐女记射筹,复有管弦酒食以助余兴。因之,游乐的意义比演武更为重要。



刘备画像

明代时，此山被划为蜀王府墓葬区后，即成为禁地。习射、游山之风遂绝。但武担山与学射山相比，那就大大地出名了。

扬雄《蜀本纪》云：“武都山精，化为女子，蜀王纳为妃，未几物故，王发卒之武都担土，葬于成都郭中，号曰武担。”常璩《华阳国志》说：“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武都北角武担是也。”

简言之，武担山是因为“武都担土”的典故而得名。因之，此山亦名武都山。

已故成都史学家冯水木说，传说开明王朝九世将都城从双流樊乡迁到成都，以武担山（今北较场）为全城中心。成都地形北高南低，以北为中心符合其走势，再加上北靠凤凰山、回龙山，西有青城山东有龙泉山拱卫，水朝东、南方向流。北门居高，自然成为成都最早的政治文化中心。然此处并没有进行过大面积考古，不能确定。但不管如何，此乃古时成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域之一无疑。

武担山上还有一石镜，因之又名“石镜山”。

这山即为王妃墓地，其上有古迹五丁塔，五丁塔建于墓葬之上，高约与十层楼房相齐。

武担山长期担任着成都中轴线的功能。罗开玉说：“秦筑成都大城，其城北的咸阳门、城南的江桥门，便与北郊的武担山山峰相垂直，形成三点一线。其后，汉代增筑十八城门，仍沿袭这一风水布局。到了隋城时代，大城的江桥门、北门与隋城的北门、武担山山峰形成四点一线。唐高骈扩筑罗城，将武担山包在城内，大城的南城门、北城门与武担山山峰仍为三点一线。但罗城的南门万里桥门有意稍往西南偏，北门太玄门有意往东北偏，以避免穿城风。”这说明，武担山在成都城市规划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然而，武担山实则算不上一座山。这山只是高约二十米、宽四十米、长一百余米的小土丘，且土质与成都平原有所不同。武担山略呈长马鞍形，西高东低，凸起的两个土阜称为东台、西台。清时，东台有一塔，名芙蓉塔，六角七级，在当时登塔可俯瞰成都之郭、检二江及蓉城全景。其占地面积六百八十八平方米。

因与周朝时的蜀王相关，也就是难得的古山。

秦汉时期，武担山成了当时成都的重要地名。《后汉书》李贤注谓：“武担山

在今益州成都县北二十步”。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武担，山名，在成都西北，盖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

蜀汉时，刘备在此建立都城，不知其意是否与此相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在今天的文殊院后面、西马道街有一古娘娘庙，传为刘备家庙。此处距离武担山距离并不远。

史料亦有记载，南北朝至唐宋，其上建有咒土寺。唐宋时两台上还建有暑雪轩。此时，皆为成都名胜。

因武担山是成都名山，自然不乏后人题咏。如唐人苏颋《武担山寺》：“武担独苍然，坟山下玉泉。鳌灵时共尽，龙女事同迁。松柏衔哀处，幡花种福田。讵知留镜石，长与法轮圆。”

宋人孙应时《武担山感事》：“客里愁如积，朝来意亦欣。鸣阶无宿雨，度隙有归云。且免泥盈尺，犹祈岁十分。中原念淮浙，不忍话传闻。”

陆游在他的《行武担西南村落有感》亦有感叹：“最怜高冢临官道，细细烟莎遍烧痕”。又有诗《春残》：“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倦游自笑催颜甚，谁记飞鹰醉打围。”

宋人吴拭有诗《暑雪轩》：“咒土台头寺，披襟笑语间。千年云抱石，六月雪弥山、酒熟篱尝外，茶新碾试间。要须时点笔，来此赋躋攀。”诗人周焘和了一首：“崇台穷石照，气味乐偷闲。南陆朱明驭，西阑白雪山。茶瓯回舌本，尘尾落谈间。欲缀风烟句，弥高不可攀。”参加唱和的还有孙俟、王泮等人，可见此时的暑雪轩是成都人不可不逛的名胜。

这也是不同时期的文人雅士对武担山的题咏。

查《成都文类》，题咏武担山的人颇多。比如名列“初唐四杰”的大诗人王勃作《晚秋游武担山寺序》，极写武担山之秀丽景象，传为佳作；唐朝的一代诗圣杜甫在游览武担山时也曾以“石镜”为题咏诗有“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之句，睹物生情溢于言表。晚唐才女薛涛在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邀她共游武担山寺时表示婉拒，并叹命运的凄苦，亦吟诗曰“侬心犹道青春在，羞看飞蓬石镜中”。此外，宋朝的欧阳修、陆游，清朝的赵熙等文学家都曾对武担山及其典故进行题咏。

关于石镜，《四川通志》载：“今武担山上有石，径五尺，厚五寸，莹澈可鉴，号

曰石镜。”杜甫将其比喻成月轮，薛涛形容为妆镜。然而这只是石块半埋土中，外露部分，形圆光洁，所以才会被误以为是石镜。相传，此一石镜在原西台暑雪轩中，清以后在暑雪轩址上建一塔一亭。

有史料记载，明代成都，以武担山—明蜀王府（今天府广场）—红照壁为中心线，所以这一带也被称为“小北京”。

民国时，武担山又有新变化。这多跟抗战相关。

一九三五年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在北较场建校，附近数街，皆以校本部及兄弟军分校所在地先后改名，武担山在其校园内。《成都城坊古迹考》说：“抗战时，军官学校改武担山街为洛阳路，新建瞭望塔于山顶。石镜为其所埋，不能复见。”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亦在军校就读，虽无资料查证他是否登足武担山，但却也不妨猜想一下，他闲暇时也会到武担山怀古幽思的吧。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从北较场撤离到凤凰山机场，飞往台湾，由此开始了两岸分离的局面。

这以后武担山依然保存于成都军区大院内，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古迹名胜遭到毁坏，山上乱石成堆，树木凋残，山下杂草丛生，而取土筑房也使其面积缩小，名胜古迹已是徒有虚名。后经过成都军区第一招待所大力修缮，保护甚好，如今武担山上各处均有碑记，林木茂盛，黄葛、雪松参天，春夏杜鹃花万紫千红，秋冬有菊花蜡梅盛开。

不过，如今的武担山并不对外开放，其故事流传的版本也就多样，但有不少是因其神秘才引起的种种猜想吧。

成都创城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成都城的建造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考察成都城市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沿着古府河与古南河的两江修建城市的想法，很显然是综合了成都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与思考。

成都平原在古蜀时代，河道是众多的，除了古油子河与古清水河之外，还有许多散布在成都平原的支流，一旦发生洪水，成都平原是一片汪洋，因此治理水